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郑通涛

WESTERN SIN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 西方汉学

# 与

汉语特征研究

方环海 郑通涛◎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郑通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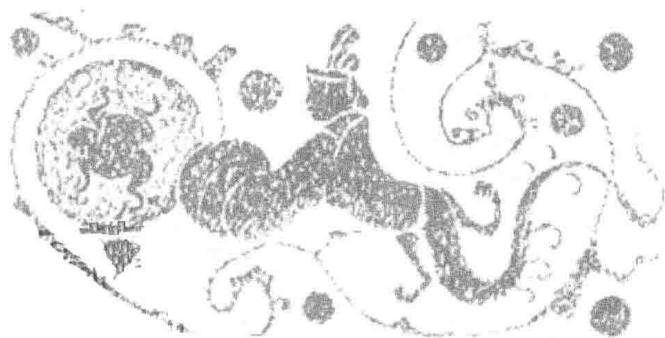
# 西方汉学

WESTERN SIN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 与

# 汉语特征研究

方环海 郑通涛◎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汉学与汉语特征研究 / 方环海, 郑通涛编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3

ISBN 978-7-5192-0933-9

I. ①西… II. ①方… ②郑… III. ①汉学—研究—世界②汉语—特征—研究 IV. ①K207.8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694号

西方汉学与汉语特征研究

---

总策划 王颖萱  
策划编辑 汪玲  
责任编辑 李玄梅  
封面设计 行言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电话 020-84459702  
印刷 北京天河印刷厂  
规格 710mm×1000mm 1/16  
印章 15.2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92-0933-9/H·1036  
定价 6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总序

郑通涛

国际汉语教育是面向国际汉语学习者的以汉语文化教学为载体的教育实践过程，是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国际汉语教育虽起步较晚，但跨越国界的汉语教育实践活动则源远流长，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中国语言文化典籍的外传、西方汉学的兴起发展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等便是最好的明证，也为当今国际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结晶。国外开展语言国际推广教育的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早在15世纪，“语言作为立国的工具”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18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政府都把语言推广看作是“教化属地内有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也是除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个层面的外交活动。

在当今强调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的时代，语言的国际教育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有效工具，也是获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语言的国际化程度已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向国外推广本国语言更是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因而，语言的国际教育就不只是语言的教学和推广，更重要的是以本国语言为载体，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使本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借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纵观国外的语言推广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这样两点共识：一是各国普遍将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国际化纳入其强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将语言教育和文化推广相结合是发达国家向外传播自己的语言时所采取的一个基本政策。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借助语言国际教育在各国人文外交中逐步声名鹊起，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语言教学、教育文化交流、国际服务等分支机构，以促进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语教育承前启后，日渐由零散走向系统，展现出全新的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国际汉语教育也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和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它以国际汉语学习者为中心，研究国际汉语学习者汉语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国际汉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途径与特点，国别化汉语教育的课程、教材、教法，国际汉语教育所涉及的各种教育测评问题，不同国家的语言国际教育之对比，以及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等。较之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

教育所研究的对象和规律,拓展到教学方法之外的教育学诸多分支领域,研究问题的转变带来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学科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既要分析总结国际汉语教育的实践和现象,也要研究在跨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国际汉语教育的理论和规律,探索汉语国际传播的机制、路径、策略和手段,因此,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计算机科学等都进入了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研究视野。

首先,国际汉语教育以汉语教学为载体,因此必须在汉语语言学理论上研究作为外语或二语的汉语本体的特点、结构和功能,它一方面可直接为国际汉语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又可加深我们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促进汉语的本体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汉语语言学和汉外语言对比成为学科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第二,国际汉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就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并针对国际汉语教育的实际需求,确立教育教学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使国际汉语教育既体现出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阶段性,又体现出本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这些都与教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密切相关。

第三,国际汉语教育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涉及国际汉语学习者的生理、情感、认知因素,学习迁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等,也涉及国际汉语教师的心理素质、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发展规划等,这些都与心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有密切关系。

第四,国际汉语教育对象学习汉语的过程,实质上是跨越自己的母语文化学习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国际汉语教育要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实际上是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中所包括的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均与文化有关,因而国际汉语教育需要以文化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为指导。

第五,国际汉语教育本质上也是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和传播过程,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国际汉语教育需要以传播学理论作为指导,以提高汉语文化教育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六,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需要以国际关系学及公共外交理论作为指导,研究如何通过汉语文化国际教育机制体制和区域化国别化策略,提升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丰富中外人文交流的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形成国际舆论,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良好的形象,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国外在语言国际教育领域的成果与经验,对我国国际汉语教育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诸多启发和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国学界已经或正在把国外语言国际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引入国际汉语教育的实践与科研之中,在借鉴国外语言国际教育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同时,努力探索符合汉语与中国自身特点的国际汉语教育之路。

汉语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载体和支撑。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主要难点是什么？如何降低汉语学习的门槛，帮助外国人更快更好地掌握汉语，这是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汉语教学的母语国，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外来模式的借鉴，必须具有国际领先和模式输出意识，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品牌。在汉语教学国际化进程中，掌握制定规则、输出规则的主动权，这是决定我们能够引领国际汉语教育潮流的重要之举。

为此必须进一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的深化和教学实践的创新，在借鉴、吸收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应着重从汉语内在的特征和自身规律出发，建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基础理论。一是进行针对外国学习者的汉语本体研究，侧重点是教学中的难点以及汉语跟学习者的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差异，并结合学习者的认知心理和语言习得以及跨文化交际等对汉语进行多角度综合研究；二是进行汉语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包括习得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研究；三是进行针对教学实践和解决遇到的瓶颈问题的研究，包括教学案例、课堂教学设计、教学管理、测试评估、语料库建设、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现代教育技术等研究与推广。

由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共同策划推出了《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收录了当今国际汉语教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作了编排。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还邀请包括两岸知名学者在内的海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赐稿或参与点评，共同探讨国际汉语教育的热门话题，体现了两岸和海内外学者跨学科的协同创新。

我们衷心希望本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也为推动两岸国际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一点应有的贡献。

# 代序：汉语特征研究的三个关键词

如果从 1898 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开始算起，我国的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 110 多年的发展历程。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放在国际语言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朱德熙等学术大家早就在汉语研究中发现一些特别吊诡的“印欧语眼光”现象，即中国语言学界一直运用西方印欧语的理论体系来研究汉语事实，比如，汉语研究为证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提供了大量材料；汉语研究抛弃传统的语言学优势，转而投入西方语言学的怀抱而亦步亦趋，致使大量所谓“跟踪性研究”占据了许多刊物的宝贵版面；有的甚至不惜“全盘继承”，削汉语之足而适西方理论之履……实有太多将“中国茅台”装入“西方 XO”的瓶子的现象。

这样说，不是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完全不适用于汉语研究，而是观照视角的问题，抛去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结，必须要承认的是，传统语言学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成果确实不多。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沈家煊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叫做《汉语不是英语》，说的是对汉语特征的强调，无独有偶，台湾的余光中也做过《当中文遇到英文》的演讲，也是强调汉语的独特性，沈家煊先生的当然是语言学视角，余光中的则是文学的视角，出发点虽然殊异，不过其表达的旨归却完全一致，那就是必须重视对汉语特征的考察。站在把汉语国际推广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我看来，汉语特征的研究必须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后，更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思索。可以说，不了解汉语的特征，很难有效地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甚至也很难实现汉语国际推广的未来大业。

## 关键词之一：类型观

在类型层面研究汉语的特征，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在 1923 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就提出许多关于汉语的特征的重要论点：中国语是单音节的，又是没有形式变化和附加语的孤立语，但是用单音语料复合的语词很丰富；没有正式的词法，文法上的范畴用语词序次表达；有“文言”和“俗语”的区别，等等。30 年代以来，汉语特征研究在汉语本体研究中颇受关注，黎锦熙等大师都致力于探索汉语的特点。20 世纪 80 年代，吕叔湘、朱德熙、张斌、胡裕树、林焘等大学者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都就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做过一番相当准确的总结和表述。90 年代之后，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专家就提出了，对外汉语

教学必须关注汉语的特征。吕必松教授说过,“正确认识和阐明汉语的特点,有助于改进教学方法,把握教学重点和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也有助于帮助学生排除母语干扰,增强学习的信心,缩短形成用汉语思维的过程。”但后来关于汉语特征的研究往往就语音、词汇、语法等分科分别进行深入探讨,缺乏整体归纳和主次分析。在外语界,学者们也做过长期努力,但多半只是限于纯语言学的研究或用来指导外语教学,并没有用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特征无疑都是基于类型比较而得出来的,特征也在多个层面得以体现,不仅是在汉语系统层面,而且也抱括学界所推崇的汉语“普方古”立体式研究范式。特别重要的是基于共时状态的类型对比,更可以在类型学视野中通过“类型之眼”解释汉语的特征,汉语的特点要在和世界上诸多语言进行比较而凸显出来,历时看,暗含与古代汉语不同的特点,共时看,也有异于汉语本体的理论研究。

近些年来,受西方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共性研究的影响,对汉语自身特征的研究有所削弱。由于对汉语的类型特征研究不深入,关于汉语的类型描写也未能到位,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把汉语的类型特征运用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去,这还远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汉语特征的纯语言学研究 and 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从汉语国际教育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汉语特征,并不在于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研究侧重在实际教学中的难点以及汉语同学生母语的类型异同,特别是不同类型特征之所在。目前,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特别重视对汉语特征的研究,或许也正是基于这样思考而做出的学术选择。

## 关键词之二:认知观

本世纪初,美国为首的国际科学界曾经在华盛顿联合发起了一次有科学家、政府官员等各界重要人物参加的圆桌会议,会议就“会聚四大技术,提升人类能力”这一议题进行了研讨,“会聚技术”即包括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等四个主要领域(简称NBIC)的协同与合作,并首次提出了“NBIC会聚技术”的概念,这也成为目前整个科学体系的基本点。其中认知科学主要研究知觉、学习、记忆、推理、语言理解、注意、情感等认知现象。目前认知科学包括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是当今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语言学由此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据自己的独特位置。

认知体系里的语言学应该是个泛称概念,指的是有关语言研究的科学,与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范围相差很大,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以及其他有关的语言学学科都可以归入认知科学所囊括的研究范围。虽然语言学只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部分,



但以探索人类语言结构(包括语音韵律、句法结构、语义关系等)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语言学研究一直在认知科学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说语言学逐步向认知方向发展,汉语特征的研究应该顺应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站在认知研究的视角看,20世纪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的基本特征是“去语境化”,即分析语料完全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倘若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作为观察点,大致就可以把握住20世纪语言研究中“去语境化”背后的历史逻辑。而现在,语言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越来越倾向“语境化”,其中“认知语言学”就体现了比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语言学更多的“语境化”趋势,把基于交际的语言的社会属性归入语言的语境范畴,这与对语言的种系发生学上的普遍性思想认识的转变密切相关。

同时,将词汇学重新引入语言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导向。就“认知语言学”而言,其语境功能在构式语法理论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一理论起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句法与词汇并非截然分立,而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所谓“构式”,是指包含词汇材料的句法结构。事实上,即使在生成语言学领域内部,这一理论趋势也很明显。这一研究趋势似乎说明,语言规则的描写其实可以应用到对词汇的描写,汉语词汇特征的研究值得挖掘。

最后,意义应该成为语言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心。语言结构表现的就是概念化,这就是说,概念化才是语言结构的核心内容,概念化比纯粹的指称关系更为深刻。它包括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词的意象、感知的路径、意义组合的路径等。还有,语言都有其经验基础,表现出来的也是概念化,这也就是说,概念化与人类体验现实的方法密切相关,汉语的语义特征更是如此,语言与概念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认知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语境化了的意义的思想与观念。

当代语言学这一语境化发展趋势,使得我们思考,基于“认知之眼”,对汉语特征的研究也必须放在认知视野中研究,或许这与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个认知过程是完全合拍的。

### 关键词之三:他域观

近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的孔子学院“新汉学”计划,其实关注的就是引导西方人如何理解与研究中国,我们在推广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要了解别人的想法与看法。这种思路可以用来反向运用“他域观”来进行汉语的特征研究,并且可以作为汉语特征类型研究与认知研究的重要补充。所谓的“他域观”,就是利用域外的文献资料,研究汉语的特征,当然也可以是域外学者研究汉语特征所具有的理论意识。

这种他域观的研究,具有不同的角度、框架与方法。

西方从 16 世纪以来,各国汉学家在进入中国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之前,第一步就是要学习汉语,因此西方汉学研究为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他们留下的一大批跟汉语教学相关的汉语研究专著以及词典、课本等,构成了西方汉学中具有独特意义的汉语语言学研究景观,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汉语语言文化现象,也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学术在西方的一种形态,可以说,西方汉学甚至早就应该成为中国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所言,近代以来的汉语研究是在三个地域开展的,一是欧洲本土;二是在港澳、南洋一带;三是在中国本土。要说汉语语法的研究,近代以来直到 19 世纪末欧洲本土的研究应该对中国本土的研究影响更大。

如果从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首开汉语语法研究,到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若瑟《汉语札记》(1831)出版,其间与之后先后出版了数十部汉语研究著作,根据统计,截至 1921 年,西方汉学领域关于中国语言的研究论著就达到 1221 部,即使根据伦敦图书馆的统计,仅仅在 1800 年前关于中国语言的研究论著也近百部,而大量的中国语言研究论著都是在 1800 年后出版的,足见西方汉学领域对汉语研究的重视,站在“他域之眼”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中提取有关汉语研究的材料,是开展汉语特征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近代以来,有很多西方学者基于学习者、研究者、教学者的三重身份观照汉语的特征,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虽然其原始旨归是为了西方人更好地学习汉语,但客观上也起到了让西方人理解与了解汉语特征的目的。从西方早期的瓦罗,到后期的马礼逊、艾约瑟、苏谋斯,甚至是现今的罗杰瑞等,既有汉语文化圈内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也有汉字文化圈之外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他们都在有关的论著中对汉语特征有所揭示,这些文献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爬梳与深入研究。我们试图以早期的欧洲汉学为抓手,揭示西方汉学研究在汉语特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或许可以与今天国内的汉语特征研究相互参照,从而完整地対汉语特征进行考量。

对这一点,我们想多唠叨几句,西方汉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对汉语特征所做的研究,迄今仍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汉语学术界从这个角度开展综合专题研究的成果仍然凤毛麟角,在汉语国际教育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该领域研究的开展亟待加强。

## 不是结语

即使在世界范围看,我国汉语语言资源之丰富也是极其少见的,应该也可以为世界的语言特征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如果汉语作为语言事实,那么我们看待这一事实起

码要有“类型之眼”“认知之眼”和“他域之眼”，用上这“三只眼睛”才可以逐步揭示出汉语的特征。这一研究，既有利于纠正汉语本体研究的“印欧语眼光看待汉语”的影响以及脱离实际忽视语言教学应用的倾向，同时也会改变汉语国际教育中简单照搬西方教学理论而不重视按照汉语的特征开展二语教学的现状。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正是我们的学术追求。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所忧虑的那样，汉语语言学研究，在多少年以后，会有多少东西是值得西方人来向我们学习的？不进行汉语特征的研究，很难提高汉语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汉语语言地位的大幅提高，构建世界语言学研究体系必须要有汉语研究的参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也需要世界的了解。



西方汉学中汉字注音一瞥 .....	1
美国汉学对汉语语音特征的认识及研究	
——以卫三畏《中国总论》为中心 .....	14
17 世纪波兰汉学的汉语声母特征分析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拉丁注音为中心 .....	28
西方汉学中汉语语法观的自我复制与传播	
——从《中国文法》与《中华帝国通史·汉语文法概略》的互文性说起 ...	43
卫三畏对汉语语法特征的认识及研究 .....	55
罗存德及其汉语论著的特征考察 .....	69
欧洲汉学视域下汉语副词特征认知的流变 .....	89
英国汉学中的汉语词类特征研究	
——以《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与《汉语手册》的对比研究为例 .....	109
《汉语手册》(1863) 与《语言自述集》(1867) 的词类观比较 .....	121
西方汉学中的汉语量词特征研究	
——以《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57) 和《汉语手册》(1863) 为中心 .....	135

美国早期汉学中汉字特征的认识和研究

——以《中国总论》为中心 ..... 153

西方英文期刊与汉语传播研究的汉学视野 ..... 170

附录:

附录一:西方汉学视域中的中国雅文学

——以卫三畏《中国总论》的考察为中心 ..... 182

附录二:19世纪英国汉学中的汉语与汉字特征述论(1853) ..... 198

附录三:罗马字母表在东亚地区语言中的应用(1863) ..... 211

后记:永远的事业 ..... 227

## 西方汉学中汉字注音一瞥<sup>①</sup>

【导读】《汉字文化》杂志在2013年第5期刊载了首都师范大学宋均芬教授的论文《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以下简称宋文）。文中介绍了古今中外诸多汉字注音方案，包括在古代使用的如“读若”和“反切”等传统注音方法、近现代使用的如利玛窦方案和威妥玛式拼音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注音符号以及当下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等。本文拟对利玛窦方案出现之前和利-威之间出现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音方案进行梳理，以之对宋文做出补充。

2013年《汉字文化》杂志在第5期上刊载了首都师范大学宋均芬教授的论文《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以下简称宋文）。文中从汉字注音的最初诞生，发展直到成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介绍和梳理，阅后受益匪浅。当然，也许是受篇幅所限，宋文对汉字注音前世与今生的介绍中，将重点放在了“今生”，而“前世”部分，则稍有省略。关于“汉字注音的前世”，事实上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对“汉语注音的今生”，宋文分为两类，一类是罗马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式；另一类是注音字母式，而关于第一类，宋文中主要介绍了利玛窦方案和威妥玛式拼音。

事实上，从利玛窦注音方案到威妥玛式拼音和邮政式拼音的产生，其间逾300年，甚至在利玛窦注音方案产生之前，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出于种种目的，已经在不断地尝试破解汉语这种古老又陌生的语言。自16世纪中后期起，在西方有相当多的汉学家编著过与汉语相关的字典、词典、韵书和语法著作，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汉语设计了自己的注音方案。可以说，从利氏拼音到威氏拼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学者关于汉语尤其是汉语语音认知的演进过程。其中，许多学者及其汉语论著，对汉语研究做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利玛窦和威妥玛。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海外汉学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一些尘封在国外图书馆和资料室的论著正在逐渐被国内学者发现并研究，有关西方汉学的研究迅速丰富，而在汉语语音领域，自利玛窦到威妥玛之间的汉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从不为人知到逐渐走入学者们的视野。本文拟对利玛窦方案出现之前和利-威之间

①本文系与复旦大学王仲男博士合作，原文刊载于《汉字文化》2014年第4期。

出现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音方案进行梳理，以之对宋文做出补充。

## 一、19 世纪以前西方汉语注音概况

虽然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我们国人制定的，但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并不是当时的学者凭空编写出来的，而是也处在罗马字母注音汉语历史的轨迹之中。几百年间，包括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诞生以及演进和发展，可以说，都是西方学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初才有所改变。

### （一）汉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的起源

掌握一种语言，首先就要掌握这种语言的发音，而当时中国的韵书几乎都使用反切的方法为汉字注音。反切在中国音韵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然而，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宋文中提到，反切的经典教材《广韵》中，用来表示声母的上字有 452 个，表示韵母的下字则多达 1200 多个。试想对于从未接触过汉语的西方传教士来说，要掌握这 1000 多个汉字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这种方法不易于进一步传播。也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才催生了传教士开始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为汉语注音。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究竟始于何时？宋文引用了罗常培先生的著作《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中提到的利玛窦注音方案，认为利玛窦方案是西方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最早的一套方案。事实上，这一点并不准确。

利玛窦注音方案诞生于 16 世纪末，而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并非偶然。16 世纪初，西方国家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海上航线，商人、使臣和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1552 年，耶稣会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来到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也开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序幕。其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播福音，势必要掌握汉语，特别是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sup>①</sup> 来到中国后，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要求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而在此之前，西方人对汉语的认识，只停留在一些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作品、书信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之中，16 世纪中期之后，开始有部分传教士主动学习汉语。在当时，要寻找到通晓西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才几乎不可能，早期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十分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先行者们如利玛窦、罗明坚等人，努力掌握汉语不仅仅是有助于他们在华传教，对后来的传教士更有着非凡的意义。

虽然该方案现在习惯称为“利玛窦方案”，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利玛窦方案的诞生并不是利玛窦一个人的功劳，甚至可以说，利玛窦在该方案的产生过程中的贡献并不是最大的。利玛窦方案，源于利玛窦所著的《西字奇迹》，

<sup>①</sup>范礼安神父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沙勿略之后，罗明坚之前来到中国，认为在华传教需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并要求传教士们学习中文。虽然他在研究汉语上没有专著问世，但无疑他对后来的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影响非凡，也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汉语史上第一份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汉字读物。《西字奇迹》编著于1605年，而在这之前，有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已经使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这就是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编著的《葡汉辞典》。一般认为，《葡汉辞典》编著于1583年到1588年，然而20世纪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一部作品的存在，所以当时有学者追述罗马字母注音汉语体系时，仅仅研究到利玛窦《西字奇迹》，如罗常培（1930）提到“本篇根据的材料，除去《西儒耳目资》<sup>①</sup>以外只有《程氏墨苑》<sup>②</sup>里利玛窦的注音”。直到1934年，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史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中发现了一部手稿。其中32—165页是这部手稿的主体，为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词典，后被德礼贤命名为《葡汉辞典》，而辞典以外的部分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神学、天文学知识等，其中有一个小册子《宾主问答私拟》<sup>③</sup>，作为传教士学习日常会话之用。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葡汉辞典》基本已经可以认定为最早使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作品，其中注音方案也可以认定为汉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的起源。

《葡汉辞典》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合作编写的一部作品，但是利玛窦方案被认为出自于《西字奇迹》而非《葡汉辞典》<sup>④</sup>，主要是因为该辞典编写过程中，罗明坚编写的部分更多。罗明坚同利玛窦一样，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他加入教会之前就拿到了两个法学博士学位，1579年到达了在中国，并遵从范礼安神父的要求，开始努力学习汉语。他天赋极高，并且自身性格坚忍不拔，因而来了几个月便能认识许多汉字，3年后就可以使用中文写作了（张西平，2001）。除了《葡汉辞典》以外，他也是最早把儒家经典译成西方语言的学者，翻译了《三字经》和《大学》等作品；不仅如此，罗明坚还写出了西方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并在西方绘编了第一幅中国地图集。

由于利玛窦的巨大影响，人们往往忽略了罗明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罗明坚的研究走向深入，其历史地位也得到了肯定，张西平（2001）曾经称之为“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利玛窦在1582年进入中国时，实际上就是受到了罗明坚的举荐和邀请，而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时，罗明坚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据此，谭慧颖（2008）考证罗明坚为使用罗

①《西儒耳目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的一部关于汉语的韵书，在后文会有更多的介绍。

②利玛窦和其他几位传教士编著《西字奇迹》后，赠与制墨大师程大约，而程大约将《西字奇迹》编入自己的墨模雕刻图谱集《程氏墨苑》中。

③《宾主问答私拟》原名 Pin chù wen tà ssi gni，关于注音和译名的考证参考陈辉（2007），第158—159页。

④利玛窦和郭居静1598年合作编写了一部汉欧字典，但现已失传。事实上，如果该字典得以现世，较之《西字奇迹》中仅出现了几百个汉字的注音，该部字典应该成为“利玛窦系统”最主要的载体。



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第一人，张西平（2001）也认为“《葡汉辞典》主要是罗明坚所编，利玛窦只是作为助手出现的，《葡汉辞典》中的中文语词部分也可能是罗明坚亲自撰写”。杨福绵（1995）称《葡汉辞典》整理出来的注音方案为“罗明坚方案”，区别于以《西字奇迹》为代表的“利玛窦方案”。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汉字的罗马字母注音始于罗明坚和他的“罗明坚方案”。该方案包括了24个声母和46个韵母（见附表）。当然，虽然据有首创之功，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罗明坚系统的诸多不足。杨福绵（1995）提到它在声母和韵母拼写法上尚未定型，甚至有些混淆的地方，经常出现一音多号的现象，另外，罗氏系统没有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sup>①</sup>。相比来说，宋文介绍的利玛窦方案，则较之罗明坚方案有了很大的改进，最主要的就是“-”“^”“˘”“、”“ˇ”来表示5个声调以及用c来表示送气音。

罗明坚和利玛窦是西方人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最早尝试者，他们设计这两套注音方案的过程中，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sup>②</sup>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传教士，不仅是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更是早期西方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中关于汉语语音研究的先行者。

## （二）金尼阁系统与其他汉语注音方案

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后，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是汉字注音史上另一位重要的人物。金尼阁是法籍耶稣会士，1577年生于尼德兰佛兰德斯的杜埃城<sup>③</sup>，于1610年利玛窦逝世之后到达澳门，并于1611年到达南京，正式开始自己的传教生涯。在人生最后几年，金尼阁定居杭州，于1626年在王徽、韩云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编著西方人的第一部汉语语音韵书——《西儒耳目资》。

《西儒耳目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译引首谱》，第二部分为《列音韵谱》，第三部分为《列边正谱》。其中，《译引首谱》主要是理论部分，《列音韵谱》是音序字典，《列边正谱》是形序字典。在《译引首谱》部分记录的语音理论，主要围绕两个活图——《万国音韵活图》和《中原音韵活图》展开。万国音韵活图是由7个同心圆组成的图，中间相同的五圈是29个字母，最外圈是发音近似的汉字，最内圈是声调。中原音韵活图是6个同心圆组成的图，6个同心圆分为3组，分别

①杨福绵教授认为，罗明坚之所以没有标注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并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而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标注方式。谭慧颖（2008）则认为也有可能是罗明坚当时并不能很好地分辨汉语的五声。

②利玛窦（1586）提到：“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神父们选定了五个音标，使学生一看就知道该是哪个音标。中国字共有五音。郭居静神父在这方面贡献很大，他是位音乐家，音感灵敏。”另外，这段也可以明确证明了上文提到利玛窦和郭居静确实合编了一部字典，并在这部字典中加入了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

③金尼阁的国籍问题较复杂，可参考计翔翔（1997）。